

中国文学编年史

周
秦
卷

主编◇陈文新

本卷主编◇赵逸夫

湖南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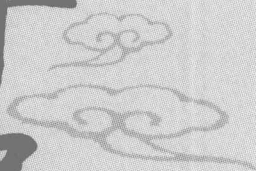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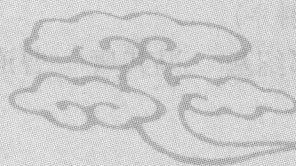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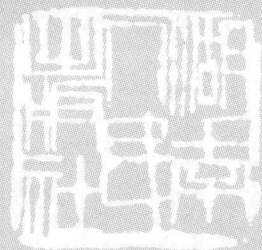
主编◇陈文新

本卷主编◇赵逵夫

中国文学编年史

周
秦
卷

盧中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编年史. 周秦卷 / 陈文新主编; 赵逵夫分册主编.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6.9
ISBN 7-5438-4528-8

I. 中... II. ①陈...②赵... III. ①文学史—编年史—中国—周代②文学史—
编年史—中国—秦代 IV. 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17562号

177

中国文学编年史·周秦卷

责任编辑: 李建国 胡如虹 曹有鹏

邓胜文 张志红 杨 纯 聂双武

主 编: 陈文新

书名题字: 卢中南

装帧设计: 陈 新

出 版: 湖南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市场营销: 0731-2226732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邮 编: 410005

制 作: 湖南潇湘出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电 话: 0731-2229693 2229692

印 刷: 中华商务联合印刷(广东)有限公司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版 次: 2006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4 1/16

印 张: 29.25

字 数: 628,000

书 号: ISBN 7-5438-4528-8/I · 445

定 价: 218.00元

《中国文学编年史》编纂委员会

顾 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卞孝萱 邓绍基 冯其庸 曹道衡 傅璇琮
霍松林

主 编 陈文新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石观海 李建国 汪春泓 陈文新 张思齐
张玉璞 於可训 赵伯陶 赵逵夫 胡如虹
诸葛忆兵 曹有鹏 熊治祁 熊礼汇 霍有明

本卷撰稿人 (按姓氏笔画排序)

赵逵夫 贾海生 韩高年 裴登峰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总序

个'如受重常非强萌明)“代时”请... 溯大其青誰对新空会风于市,基时,宗
港 甚既,然非成,案科因升初激沙一 疑想不简委下,准感其出书 (“不感”而“感
阙,涨潮自合测不译常由升平书而河笑前看夫升其已想政升内印中世学文种,人等
钱籍出而,案升升即伏跨嘉基议;诚宋升日同而书量分派,案升南成野舞思季,加
真更想制张士出,而部于已多群寺升其而,案升升即代野刻常派,宋元亦,文,有前
本日邊尚宗手以并介,《史通》重志同二》中中贾罗梅印界,案升卷不升在,而书或著
派金》的主安笑德兰礼日拜,阙改本登回百以五升,《诗经本》的派柳孟梅印界,阙伏
取因案升是不其印用除先,一第,感同前而四丁原出落空,阙改本派卷以五升,《南
高升,属印升同案升,其同社会风史考案空,案升受刻印青丁原感印升,二第,派
书升,端明前而利受受于由,夫升案科其以四,案同内而内西受受刻印界,升感印升

纪传体、编年体是中国传统史书的两种主要体裁，而编年体的写作远较纪传体薄弱。《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史部编年类小序已明确指出这一事实：“司马迁改编年为纪传，荀悦又改纪传为编年。刘知幾深通史法，而《史通》分叙六家，统归二体，则编年、纪传均正史也。其不列为正史者，以班、马旧裁，历朝继作。编年一体，则或有或无，不能使时代相续。故姑置焉，无他义也。”^①与古代历史著作的这种体裁格局相似，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写作中，也是纪传体一枝独秀，不仅在数量上已多到难以屈指，各大专院校所用的教材也通常是纪传体，这类著作的核心部分是作家传记（包括作家的创作经历和创作成就）。编年类的著作，则虽有陆侃如、傅璇琮、曹道衡、刘跃进等学者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就总体而言，仍有大量空白，尤其是宋、元、明、清、现、当代部分，历时一千余年，文献浩繁，而相关成果甚少。这样一种状况，自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套十八卷的《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纂出版，即旨在一定程度地改变这种状况。

文学史是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中展开的。纪传体的空间意识和时间意识以若干个焦点（作家）为坐标，对文学史流程的把握注重大体判断。其优势在于，常能略其玄黄而取其隽逸，对时代风会的描述言简意赅，达到以少许胜多许的境界。若干重要的文学史术语如“建安风骨”、“盛唐气象”、“大历诗风”等，就是这种学术智慧的凝

^①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第4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结。但是，由于风会之说仅能言其大概，“个别”和“例外”（即使是非常重要的“个别”和“例外”）往往被忽略，不免留下遗憾。一些跨时代的作家，如李煜、刘基、张岱等人，在文学史中的时代归属与其代表作的实际创作年代也常有不吻合的情形。例如，李煜被视为南唐作家，而他最好的词写在宋初；刘基被视为明代作家，而他最好的诗、文写在元末；张岱被视为明代作家，而其代表作多写于清初。比上述情形更具普遍性的，还有下述事实：我们讲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往往以毛宗岗修订本为例；我们讲施耐庵的《水浒传》，往往以百回繁本为例；我们讲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往往以崇祯本为例。这就出现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我们讲的并不是作家的原著；第二，我们忽略了读者的接受情形。这类涉及风会与例外、作家时代归属与作品实际创作、传播与接受两方面的问题，以纪传体来解决，由于受到体例的限制，往往力不从心，采用编年体，解决起来就方便多了：不难依次排列，以展开具体而丰富多彩的历史流程。

与纪传体相比，编年史在展现文学历程的复杂性、多元性方面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但在时代风会的描述和大局的判断上，则远不如纪传体来得明快和简洁。作为尝试，我们在体例的设计、史料的确认和选择方面采用了若干与一般编年史不同的做法，以期在充分发挥编年史长处的同时，又能尽量弥补其短处。我们的尝试主要在三个方面：其一，关于时间段的设计。编年史通常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下辖月，月下辖日。这种向下的时间序列，可以有效发挥编年史的长处。我们在采用这一时间序列的同时，另外设计了一个向上的时间序列，即：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上设阶段，阶段上设时代。这种向上的时间序列，旨在克服一般编年史的不足。具体做法是：阶段与章相对应，时代与卷相对应，分别设立引言和绪论，以重点揭示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时代特征（现当代文学因时间周期较短，拟省略阶段，不设引言）。其二，历史人物的活动包括“言”和“行”两个方面，“行”（人物活动、生平）往往得到足够重视，“言”则通常被忽略。而我们认为，在文学史进程中，“言”的重要性可以与“行”相提并论，特殊情况下，其重要性甚至超过“行”。比如，我们考察初唐的文学，不读陈子昂的诗论，对初唐的文学史进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了解；我们考察嘉靖年间的文学，不读唐宋派、后七子的文论，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景观就不可能有准确的把握。鉴于这一事实，若干作品序跋、友朋信函等，由于透露了重要的文学流变信息，我们也酌情收入。其

三，较之政治、经济、军事史料，思想文化活动是我们更加关注的对象。中国文学进程是在中国历史的背景下展开的，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均有显著联系，而与思想文化的联系往往更为内在，更具有全局性。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有意加强了下述三方面材料的收录：重要文化政策；对知识阶层有显著影响的文化生活（如结社、讲学、重大文化工程的进展、相关艺术活动等）；思想文化经典的撰写、出版和评论。这样处理，目的是用编年的方式将中国文学进程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国思想文化变迁一并展现在读者面前。

《中国文学编年史》是一个基础性的重大学术工程，文献的广泛调查和准确使用是做好编纂工作的首要前提。《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丛书集成》、《笔记小说大观》等是我们经常使用的典籍，近人和今人整理出版的别集、总集，大量年谱（如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以及文、史、哲方面的编年史，均在参考范围之内，限于体例，未能一一注明，谨此一并致谢。在使用上述文献的过程中，我们采取的是一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谨慎态度。这是因为，相当一部分典籍是由我们第一次标点，这一工作的难度是不言而喻的。即使是前人已经整理的典籍，我们也并不直接采用，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再整理一次。这样做当然增加了工作量，但确有许多好处，若干错误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得到纠正的，有些错误的纠正涉及基本事实的澄清。比如，张大复《皇明昆山人物传》卷八记梁辰鱼晚年情形，有云：“（梁氏）当除夕遇大雪，既寝不寐。忽令侍者遍邀诸年少，载酒放歌，绕城一匝而后就睡。曰：‘天为我辈雨玉，可令俗人蹴踏之耶？’时年已七十矣。亡何，中恶，语不甚了。有老奴李用者，颇省其说，尚有注记。得岁七十有三。”一位学者将“中恶，语不甚了”标点为“中恶语，不甚了”，并就此推论说：“梁辰鱼七十岁时遭遇暧昧不明的事件。”“《皇明昆山人物传》的上述记载本意是为贤者讳，事实上倒很可能为统治者隐盖了迫害异己文人的一件罪行。”这就不免弄错了事实。“中恶”即突然患急病，正所谓“老健春寒秋后热”，老年人得急病是常见的情形。而“中恶语”的表述，明显不符合古人的语言习惯。再如，陈田《明诗纪事》将正德时期的傅汝舟与明末的傅汝舟混为一人，将两人的生平搅在一起，其按语云：“丁戊山人诗初矜独造，晚遁荒诞，择其入格者录之，亦是幽弦孤调。山人享大年，具异才，谈佛谈仙，亦作北里中艳语。初与郑少谷游，晚乃与茅止生、卓去病、张文寺、文太青倡和，支离怪

诞，无所不有。少谷集中无是也。论者乃专谓山人刻意学少谷，何哉？”《明诗纪事》近三百万言，卓有建树，是研究明诗的必备案头书。但关于傅汝舟，陈田的确弄错了。郑善夫（1485—1523）号少谷，以学杜著称，学郑少谷的是正德年间的傅汝舟；文翔凤号太青，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与文太青等唱和的是明末的傅汝舟。两个傅汝舟之间相距约百年，陈田想当然地将二者合为一人，说他“享大年”，又说他前期学郑少谷，后期学竟陵派，曲意弥缝，令人哑然失笑。其他种种，如部分文学家辞典对作家生卒年的误注，若干点校本的断句错误等，我们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纠正。提到这些情况，不是想证明我们的水平有多高，而意在告诉读者：我们的工作态度是认真的，有志于为读者提供一部值得信赖的编年史著述。

《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纂得到了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华书局、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曲阜师范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单位专家和领导，尤其是武汉大学领导的支持；湖南省新闻出版局、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及湖南人民出版社鼎力支持编年史的编纂出版，所有这些，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

陈文新

2006年7月23日于武汉大学



凡例

一、《中国文学编年史》以编年形式演述中国文学发展历程，凡十八卷：第一卷周秦、第二卷汉魏、第三卷两晋南北朝、第四卷隋唐五代（上）、第五卷隋唐五代（中）、第六卷隋唐五代（下）、第七卷宋辽金（上）、第八卷宋辽金（中）、第九卷宋辽金（下）、第十卷元代、第十一卷明前期、第十二卷明中期、第十三卷明末清初、第十四卷清前中期（上）、第十五卷清前中期（下）、第十六卷晚清、第十七卷现代、第十八卷当代。

二、编年史各卷据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划分为若干章（如无必要，或不分章）。章的标目方式是：“××章 ××年至××年，共××年”。关于某一阶段文学的总体评论放在该章的首年之前，如明前期卷“第一章 洪武元年至建文四年，共35年”，在章目下，“洪武元年”之前，单列明前期卷“引言”一目。关于某一时代文学的综合论述，放在卷首。如元代卷，在第一章前，单列元代文学“绪论”。

三、编年史各卷所收录内容的构架大体统一，重点包括七个方面：1. 重要文化政策；2. 对文学发展有显著影响的文化生活（如结社、讲学、重大文化工程的进展、相关艺术活动等）；3. 作家交往（唱和、社团活动等）；4. 作家生平事迹；5. 重要作品的创作、出版和评论；6. 争鸣（团体之间、个人之间在重要问题上的论辩等）；7. 其他。

四、叙事以纲带目，即在征引相关文献之前有一句或数句概述。如，先总叙一句“俞宪编《盛明百家诗》成书”，再征引相关序跋、著录、评议。前者为纲，后者为目，纲、目配合，旨在完整地呈现文学史事实。少量见于常用工具书的重要史实，或不展开的文学史事实，则列纲而略目，以省篇幅。

五、公历纪年年初与中国传统纪年年末不属同一年份，如公元1899年元月1日至12月31日对应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十一月二十七日至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十一月二十九日，而不对应于光绪二十五年己亥正月初一至十二月三十日。我们采用变通的处理方法，以公历纪年，而以农历纪月，比如，凡光绪二十五年己亥正月至十二月之内的内容均置于公元1899年下。作家生卒年，仍据公历标注，其他以此类推。现、当代文学部分，纪年、纪月均据公历。

六、同一年内之文学史实，按月份先后顺序排列。月份不详而仅知季度的，春季置于三月之后，夏季置于六月之后，其他以此类推。季度、月份均不详者，另设“本年”目统之。

七、一部分重要文学史实，年月不详而仅知大体时段者，在年号之末另设“××年间”目统之，如嘉靖四十五年之后另设“嘉靖年间”一目。

八、引用序跋，一般采用“作者+篇名”的方式，如“臧懋循《唐诗所序》”。引用序跋之外的诗文等作品，一般采用“集名+卷次+篇名”的方式，如“《有学集》卷三一《隐湖毛君墓志铭》”，采用“作者+篇名”的方式，如“钱谦益《隐湖毛君墓志铭》”。无篇名者则省略，如“《艺苑卮言》卷三”。某作者集中所收为他人别集所作的序跋，亦采用这一方式，如“《太函集》卷二二《弇州山人四部稿序》”。引用正史，一般采用“正史名+本传或××传”的方式，“如《明史》本传”或“《明史》李攀龙传”，不标卷次。引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或用全称，或简称“四库提要”，只标明卷次。如“四库提要卷一五三”。引用地方志，标明纂修年代，如“光绪《乌程县志》卷三一”。据类书转引时，注明原出处，如“《太平广记》卷二〇《阴隐客》（出《博异志》）”。引用报刊，注明年月日或卷次。

九、作者小传一般置于生年。有些作家，虽生年在上一卷，但在上一卷无文学活动，其小传酌情移入本卷首次出现时。如杨士奇，元亡时才4岁，其小传置于明前期卷，出生时只交代：“杨士奇（1365—1444）生”，不列小传。现、当代作者，因传记资料常见，相关作家小传酌情收录。

十、对于某一作家的总体评论和重要著录一般置于卒年。某作者卒年在下一卷，但在下一卷无重要文学活动，主要评论材料酌情置于本卷。如易顺鼎（1858—1920），其评论材料集中于晚清卷，不入现代卷。

十一、作家代表作一般不录原文，但收录重要评论材料，并酌情说明相关选本收录情形。

十二、需要补充交待而占用篇幅较大的文学史事实，设少量“附录”。对若干需要辩证的史实，设按语加以说明。以提供文献线索为主，不详加征引。



绪论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季札）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讽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沍沍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其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邶》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迓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见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濩》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曁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荀子·儒效》：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风》之所以为不逐者，取是以节之也；《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

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

《史记·太史公自序》：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汉书·地理志》：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而谓之俗……秦之先曰柏益，出自帝颛顼，尧时助禹治水，为舜朕虞，养育草木鸟兽，赐姓嬴氏，历夏、殷为诸侯。至周有造父，善驭习马，得华骝、绿耳之乘，幸于穆王，封于赵城，故更为赵氏。后有非子，为周孝王养马汧、渭之间。孝王曰：“昔伯益知禽兽，子孙不绝。”乃封为附庸，邑之于秦，今陇西秦亭秦谷是也。至玄孙，氏为庄公，破西戎，有其地。子襄公时，幽王为犬戎所败，平王东迁雒邑。襄公将兵救周有功，赐受岐、酆之地，列为诸侯……故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昔后稷封邰，公刘处豳，大王徙岐，文王作酆，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穡，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

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辚》、《四载》、《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吴札观乐，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旧乎？”

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庸、卫国是也。邶，以封纣子武庚；庸，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故《书序》曰“武王崩，三监畔”，周公诛之，尽以其地封弟康叔，号曰孟侯，以夹辅周室；迁邶、庸之民于雒邑，故邶、庸、卫三国之诗相与同风。《邶》曰“在浚之下”，《庸》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庸》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卫》曰“瞻彼淇奥”，“河水洋洋”。故吴公子札聘鲁观周乐，闻《邶》、《庸》、《卫》之歌，曰：“美哉渊乎！吾闻康叔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至十六世，懿公亡道，为狄所灭。齐桓公帅诸侯伐狄，而更封卫于河南曹、楚丘，是为文公。而河内殷虚，更属于晋。康叔之风既歇，而纣之化犹存，故俗刚强，多豪桀侵夺，薄恩礼，好生分。

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本唐尧所居，《诗·风》唐、魏之国也。周武王子唐叔在母未生，武王梦帝谓己曰：“余名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之参。”及生，名之曰虞。至成王灭唐，而封叔虞。唐有晋水，及叔虞子燮为晋侯云，故参为晋星。其民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故《唐诗·蟋蟀》、《山枢》、《葛生》之篇曰“今我



不乐，日月其迈”；“宛其死矣，它人是偷”；“百岁之后，归于其居”。皆思奢俭之中，念死生之虑。吴札闻《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

魏国，亦姬姓也，在晋之南河曲，故其诗曰“彼汾一曲”；“置诸河之侧”。自唐叔十六世至献公，灭魏以封大夫毕万，灭耿以封大夫赵夙，及大夫韩武子食采于韩原，晋于是始大。至于文公，伯诸侯，尊周室，始有河内之土。吴札闻《魏》之歌，曰：“美哉沍沍乎！以德辅此，则明主也。”

及《诗·风》陈、郑之国，与韩同星分焉。郑国，今河南之新郑，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虚也。及成皋、荥阳，颍川之崇高、阳城，皆郑分也。本周宣王弟友为周司徒，食采于宗周畿内，是为郑。……幽王败，桓公死，其子武公与平王东迁，卒定虢、会之地，右雒左沛，食溱、洧焉。土狭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郑诗》曰：“出其东门，有女如云。”又曰：“溱与洧方濯濯兮，士与女方秉菅兮。”“恂盱且乐，惟士与女，伊其相谑。”此其风也。吴札闻《郑》之歌，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陈国，今淮阳之地。陈本太昊之虚，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陈诗曰：“坎其击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鹭羽。”又曰：“东门之粉，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风也。吴札闻《陈》之歌，曰：“国亡主，其能久乎！”自胡公后二十三世为楚所灭。

《汉书·艺文志》：《书》曰：“诗言志，歌永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也。

《文章流别论》：古有采诗之官，王者以知得失。古之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诗率以四言为体，而时有一二句杂在四言之间，后世演之，遂以为篇。

《文章缘起》：六经素有歌、诗、诔、箴、铭之类，《尚书》帝庸作歌，《毛诗》三百篇，《左传》，叔向《治子产书》，鲁哀公《孔子诔》，孔悝《鼎铭》、《虞人箴》，此等自秦汉以来，圣君贤士著为文章名之始。

《文心雕龙·征圣》：夫鉴周日月，妙极几神；文成规矩，思合符契；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而藏用。故《春秋》一字以褒贬，《丧服》举轻以包重，此简言以达旨也。《邶诗》联章以积句，《儒行》筹说以繁辞，此博文以该情也。书契决断以象爻，文章昭晰以效离，此明理以立体也。四象精义以曲隐，五例微辞以婉晦，此隐义以藏用也。

又云：《书》云：文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立辩有断辞之美。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颜阖以为仲尼“饰羽而画，从事华辞”。虽欲譬圣，弗可得已。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

《文心雕龙·明诗》：昔葛天乐辞，《玄鸟》在曲；黄帝《云门》，理不空弦。尧有《大章》之歌，舜造《南风》之诗，观其二文，辞达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叙惟歌；太

康败德，五子咸讽：顺美匡恶，其来久矣。自商及周，《雅》、《颂》周备，四始彪炳，六义环深。子夏鉴绚素之章，子贡悟场磨之句，故商赐二子，可与言诗。自王泽弥竭，风人辍采，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深文。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秦皇灭典，亦造《仙诗》。

《文心雕龙·诠赋》：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瞍赋。”《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途，实相枝干。故刘向明“不歌而颂”，班固称“古诗之流”也。至如郑庄之赋“大隧”，士芳之赋“狐裘”，结言短韵，词自己作，虽合赋体，明而未融。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者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

《文心雕龙·颂赞》：昔帝誉之世，咸黑为颂，以歌《九招》。自《商颂》以下，文理允备。夫化偃一国谓之《风》，风正四方谓之《雅》，容告神明谓之《颂》。《风》、《雅》序人，故事兼变正；《颂》主告神，故义必纯美。鲁以公旦次编，商以前王追录，斯乃宗庙之正歌，非飨宴之常咏也。《时迈》一篇，周公所制，哲人之颂，规式存焉。夫民各有心，勿壅唯口。晋舆之称“原田”，鲁民之刺“裘鞞”，直言不讳，短辞以讽，邱明子顺，并谓为颂，斯则野颂之变体，浸被乎人事矣。及三闾《橘颂》，辞采芬芳，比类属兴，又覃及细物矣。至于秦政刻文，爰颂其德。汉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并作，相继于时矣。

《文心雕龙·祝盟》：昔伊耆始蜡，以祭八神。其辞云：“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勿作，草木归其泽。”则上皇祝文，爰在兹矣。舜之《祠田》云：“荷此长耜，耕彼南亩，四海俱有。”利民之志，颇形于言矣。至于商履，圣敬日跻，玄牡告天，以万方罪己，即郊禋之词也；素车祷旱，以六事责躬，则雩祭之文也。及周之大祝，掌六祝之辞，是以“庶物咸生”，陈于天地之郊；“旁作穆穆”，唱于迎日之拜；“夙兴夜处”，言于祔庙之祝；“多福无疆”，布于少牢之馈；宜社类祊，莫不有文。……春秋以下，黠祀谄祭，祝币史辞，靡神不至。至于张老贺室，致祷于歌哭之祷。蒯聩临战，获佑于“筋骨”之请，虽造次颠沛，必于祝矣。若夫楚辞《招魂》，可谓祝辞之组丽者也。

《文心雕龙·铭箴》：昔帝轩辕刻舆几以弼违，大禹勒筭虞而招谏。成汤盘盂，著“日新”之规；武王户席，题“必诚”之训；周公慎言于金人；仲尼革容于敬器；列圣鉴戒，其来久矣。故铭者，名也。观器必正名焉。审用，贵乎慎德。盖臧武仲之论铭也，曰：“天子令德，诸侯计功，大夫称伐。”夏铸九牧之金鼎，周勒肃慎之楛矢，令德之事也；吕望铭功于昆吾，仲山镂绩于庸器，计功之义也；魏颗纪勋于景钟，孔悝表勤于卫鼎，称伐之类也。若乃飞廉有石椁之锡，灵公有夺悝之溢，铭发幽石，吁可怪矣！赵灵勒迹于番吾，秦昭刻博于华山，夸诞示后，吁可笑也。至于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泽，亦有疏通之美焉。

又云：疾防患，喻鍼石也。斯文之兴，盛于三代。夏商二箴，余句颇存。周之辛甲，百官箴阙，唯《虞箴》一篇，体义备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绝。故魏绛讽君于后羿，楚子训民于在勤。战代以来，弃德务功，铭辞代兴，箴文委绝。



《文心雕龙·史传》：古者左史记事，右史记言。言则《尚书》，事则《春秋》，唐虞流于《典》、《谟》，商夏被于《诰》、《誓》。洎周命维新，姬公定法，轴三正以班历，贯四时以联事，诸侯建邦，各有国史，彰善瘅恶，树之风声。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宪章散紊，彝伦攸敎。夫子闵王道之缺，伤斯文之坠，静居以叹凤，临衢而泣麟，于是就太师以正《雅》、《颂》，因鲁史以修《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然睿旨幽隐，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

《文心雕龙·诸子》：诸子者，述道见志之书。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达，则炳曜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昔风后、力牧、伊尹，咸其流也。然篇述者，盖上古遗语，而战代所记者也。至鬻熊知道，而文王谘询，余文遗事，录为《鬻子》。子目肇始，莫先于兹。及伯阳识礼，而仲尼访问，爰序《道德》，以冠百氏。然则鬻惟文友，李实孔师，圣贤并世，而经子异流矣。

《文心雕龙·论说》：说之善者：伊尹以论味隆殷，太公以辨钓兴周；及烛武行而纾郑，端木出而存鲁，亦其美也。暨战国争雄，辨士云涌；从横参谋，长短角势；转丸骋其巧辞，飞钳伏其精术；一人之辨，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隐赈而封。……范雎之言疑事，李斯之止逐客，并顺情人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

《文心雕龙·檄移》：至周穆西征，祭公谋父称古“有威让之命，令有文告之辞”，即檄之本源也。及春秋征伐自诸侯出，惧敌弗服，故兵出须名。振此威风，暴彼昏乱。刘献公之所谓“告之以文辞，董之以武师”者也。齐桓征楚，诘苞茅之阙；晋厉伐秦，责箕郤之焚。管仲、吕相，奉辞先路，详其意义，即今之檄文。暨乎战国，始称为檄。檄者，儻也。儻然明白也。张仪檄楚，书以尺二。

《文心雕龙·章表》：夫设官分职，高卑联事。天子垂珠以听，诸侯鸣玉以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故尧咨四岳，舜命八元，固辞再让之请，俞往钦哉之授，并陈辞帝庭，匪假书翰。然则敷奏以言，则章表之义也；明试以功，即授爵之典也。至太甲既立，伊尹作书以训，思庸归亳，又作书以赞。文翰献替，事斯见矣。周监二代，文理弥盛。再拜稽首，对扬休命，承文受册，敢当丕显。虽言笔未分，而陈谢可见。降及七国，未变古式，言事于王，皆称上书。秦初定制，改书曰奏。

《文心雕龙·议对》：议贵节制，经典之体也。昔管仲称轩辕有明台之议，则其来远矣。洪水之难，尧咨四岳；百揆之举，舜畴五人；三代所兴，询及刍蕘。《春秋》释宋，鲁僖预议。及赵灵胡服，而季父争论；商鞅变法，而甘龙交辩；虽宪章无算，而同异足观。

《文心雕龙·书记》：大舜云：“书用识哉！”所以记时事也。盖圣贤言辞，总为之《书》，《书》之为体，主言者也。扬雄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故书者，舒也。舒布其言，陈之简牍，取象于“夬”，贵在明决而已。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弥盛。绕朝赠士会以策，子家与赵宣以书，巫臣之遗子反，子产之谏范宣，详观四书，辞若对面。又子叔敬叔进吊书于滕君，固知行



人挈辞，多被翰墨也。又云：谚者，直语也。丧言亦不及文，故吊亦称谚。麇路浅言，有实无华。邹穆公云：“囊漏储中。”皆其类也。《牧誓》曰：古人有言：牝鸡无晨。《大雅》云：人亦有言：“惟忧用老。”并上古遗谚，《诗》、《书》所引者也。

《文心雕龙·通变》：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唐歌《载蜡》，则广于黄世；虞歌《卿云》，则文于唐时；夏歌《雕墙》，缚于虞代；商周篇什，丽于夏年。至于序志述时，其揆一也。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榘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

《文心雕龙·事类》：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济》九三，远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书箕子之贞；斯略举人事以征义者也。至若胤征羲和，陈《政典》之训；盘庚诰民，叙迟任之言；此全引成辞以明理者也。然则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大畜》之象，“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亦有包于文矣。

《文心雕龙·情采》：《孝经》垂典，丧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尝质也。老子疾伪，故言“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韩非云“艳乎辩说”，谓绮丽也。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文辞之变，于斯极矣。研味《孝》、《老》，则知文质附乎性情；详览《庄》、《韩》，则见华实过于淫侈。若择源于泾渭之流，按辔于邪正之路，亦可以馭文采矣。

又云：昔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甚。

《文心雕龙·练字》：至于经典隐暧，方册纷纶，简蠹帛裂，三写易字，或以音讹，或以文变。子思弟子，“於穆不祀”者，音讹之异也。晋之史记，“三豕渡河”者，文变之谬也。《尚书·大传》有“别风淮雨”，《帝王世纪》云“列风淫雨”。“别”、“列”、“淮”、“淫”，字似潜移。“淫”、“列”义当而不奇，“淮”、“别”理乖而新异。傅毅制《诂》，已用“淮雨”，元长作《序》，亦用“别风”，固知爱奇之心，古今一也。史之阙文，圣人所慎，若依义弃奇，则可与正文字矣。

《文心雕龙·章句》：至于《雅》、《颂》大体，以四言为正，唯“祈父”、“肇禋”，以二言为句。寻二言肇于黄世，《竹弹之谣》是也；三言兴于虞时，《元首之诗》是也；四言广于夏年，《洛汭之歌》是也；五言见于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杂出《诗》、《骚》；而杂体之篇，成于两汉。情数运周，随时代用矣。

又云：又《诗》人以“兮”字为限，《楚辞》用之，字出句外。寻“兮”字承句，乃语助余声。舜咏《南风》，用之久矣。

《文心雕龙·丽辞》：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唐虞之世，辞未及文，而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益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丽辞，率然对耳。《易》之《文》、《系》，圣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衔；龙虎类感，则字字相偕；乾坤易简，则宛转相承；日月往来，则隔行悬合；虽句字或



殊，而偶意一也。至于《诗》人偶章，大夫联辞，奇偶适变，不劳经营。

《文心雕龙·夸饰》：虽《诗》、《书》雅言，风俗训世，事必宜广，文亦过焉。是以言峻则嵩高极天，论狭则河不容舫；说多则子孙千亿，称少则民靡子遗；襄陵举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论；辞虽已甚，其义无害也。且夫骋音之丑，岂有泮林而变好；茶味之苦，宁以周原而成饴；并意深褒赞，故义成矫饰。大圣所录，以垂宪章，孟轲所云“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也。

《文心雕龙·物色》：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漙漙拟雨雪之状，喑喑逐黄鸟之声，嘒嘒学草虫之韵，皎日擘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连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虽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及《离骚》代兴，触类而长，物貌难尽，故重沓舒状，于是嵯峨之类聚，葳蕤之群积矣。

《文心雕龙·时序》：昔在陶唐，德盛化钧，野老吐“何力”之叹，郊童含“不识”之歌。有虞继作，政阜民暇，“熏风”咏于元后，“烂云”歌于列臣。尽其美者何？乃心乐而声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咏功；成汤圣敬，“猗欤”作颂。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春秋以后，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飙骇。方是时也，韩魏力政，燕赵任权；五蠹六虱，严于秦令；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齐开庄衢之第，楚广兰台之宫，孟轲宾馆，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邹子以谈天飞誉，驺奭以雕龙驰响，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焯焯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

《文心雕龙·才略》：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辞令华彩，可略而言也。虞、夏文章，则有皋陶六德，夔序八音，益则有赞，五子作歌，辞义温雅，万代之仪表也。商周之世，则仲虺垂诰，伊尹敷训，吉甫之徒，并述诗颂，义固为经，文亦足师矣。及乎春秋大夫则修辞聘会，磊落似琅玕之圃，焜耀似锦绣之肆，遽敖择楚国之令典，随会讲晋国之礼法，赵衰以文胜从飧，国侨以修辞扞郑，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孙挥善于辞令，皆文名之标者也。战代任武，而文士不绝。诸子以道术取资，屈、宋以楚辞发采。乐毅报书辨以义，范雎上书密而至，苏秦历说壮而中，李斯自奏丽而动。若在文世，则扬班俦矣。苟况学宗而象物名赋，文质相称，固巨儒之情也。

钟嵘《诗品·总论》：昔《南风》之词，《卿云》之颂，厥义复矣。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辞（原作“谣”，本当作“繇”，“辞”字之误）曰：“名余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略是五言之滥觞也。

《史通·载文》：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

《史通·言语》：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语难晓，训释方通。是以寻理则事简而意深，考文则词难而义释，若《尚书》载伊尹立训，皋陶斯谟，《洛诰》、《康诰》、